

風和馬來世界

王大海《海島逸志》的華夷風土觀

高嘉謙
國立臺灣大學

前 言

從中國和東亞、東南亞、南亞各方國度接觸的歷史脈絡來看，海洋航路是重要的線索。無論從海上絲綢之路和大航海時代的角度而言，都印證了海域之間輪番出現的種族、文化、宗教、貿易、語言等各面向的接觸與相遇。因而鎖定海域的思路，從海洋、航道、陸海風土的敘事，可以窺見以海路為主軸的海洋視角，是另一個啟發我們思考文化交流、碰撞與發展的重要脈絡。

本文聚焦南海、馬六甲海峽，及其周邊海域，以遊記為文本，透過航路與異地生活為基點的觀察視域，檢視漢語文獻裏華人進入海域間的馬來世界，重探與構建華人與馬來世界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本文的論述進路，首先透過歷史背景和地方知識的梳理，勾勒馬來世界海域早期已出現的華夷交會，進而以十八世紀末旅居爪哇的王大海筆記著作《海島逸誌》（一七九一）為對象，檢視其涉及爪哇島及其周邊群島的人種、風物與地理描述，進而探究風土的華夷辯證，揭示王大海的島嶼視野與「風」的多元觀照。透過遊記自身的視域，從文學、文化、歷史等不同體驗和想像層

March 15, 2021 收到稿件 / May 20, 2021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1 (July 2021): 13-50

§ 高嘉謙，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mail: ccko@ntu.edu.tw

面，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筆記在表徵新世界的可能和侷限。我們觀察這些文獻如何「看見華人」，以及華人^[1]如何「看見馬來世界」。

壹、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從十至十四世紀之間，馬六甲海峽是接軌印度洋和南海、巽他海峽、爪哇海的重要航道，那是中國朝貢與海商貿易經營的重要區域。每年五至十月的西南季風與十一月至四月的東北季風在此處交會，不僅連結了印度洋與南海之間航運與貿易，讓貨品流通於中國、印度洋國家與馬來群島周邊國度的港口與市集，同時帶動亞洲東北海域與東南海域的貿易網絡，促成東方與西方海上商旅與貨品的流動。這階段的海域交會，可視為漢人與馬來人的相遇(Sino-Malay interaction)，突顯中國與馬來群島區域在貿易與外交發生的關鍵聯繫與影響(Heng 1-18)。我們關注這片廣袤海域，尤其著眼這片稱之為「馬來群島世界」(Nusantara)，馬來人、南島語族的聚居地。自公元五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先後興衰的古國——室利佛逝、巽他王國、滿者伯夷、單馬錫王國、滿喇加王國、柔佛王國，政權的興替，照見了海路上曾經輝煌的文明與文化交織。其中又以室利佛逝、滿者伯夷、滿喇加最負盛名，皆是南島語族建立的國度。

這是稱為「巫來由海」(Sea of Malayu)的早期貿易航道。印度文化和佛教的東渡，帶動貿易的興起和文化的誕生。幾個座落在中南半島，以及馬來半島北端的古國文明，如扶南、頓遜、盤盤、狼牙修(Langkasuka)、丹丹、赤土、單馬令(Tambralinga/Dharma-nagara)、羯荼等國，促進航道的興旺。此處是印度洋貿易過渡到南海的中介點，各國與城市在貿易裏的興衰，奠定了後來馬來世界(Malayu World)的形構(Andaya 18-48)。其中馬六甲海峽連結南海與孟加拉灣的海上貿易，帶來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馬來人、中國人的商品交易與文化匯聚。此處除了是東西方貨品的集散地，在馬六甲海峽兩端，這個航道覆蓋了好幾個早期海上社群，往北接南印度、斯里蘭卡，以及橫越緬甸暹羅的克拉地峽；往南則有馬來半島、蘇門答臘、新加坡、廖內群島、爪哇等周邊海域的眾多島嶼；再沿著馬來半島北上連接暹羅灣、湄公河下游、越南中南部。其中爪哇以東的班達海諸島和摩鹿加群島(Moluccas)盛產丁香、豆蔻、肉豆蔻等香料，這片被稱為「香料之路」

的海域，^[2] 自十四世紀以降引來了歐洲海上強權的香料貿易壟斷和佔領。

因為海上貿易的熱絡，中國人在十八世紀以降更頻繁走入環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爪哇島的海洋世界，面對歐洲殖民體制、南島語族與文化，這些流寓、移居的中國人與異族、異文化接觸，有著更多不同的機遇和經驗。然而異文化的相遇同時意味著傳統華夷世界觀的在地實踐與轉化。南島風土裏的華夷辯證，亦屬馬來世界變動不居的華夷風景。

從中國和東亞、東南亞、南亞的歷史的脈絡來看，華夷之辨由來已久，牽涉的是政治、外交、文化意義上的差序格局。但明清交替以降構成的「華夷變態」，近代以來關於中國與周邊的領土、主權、疆界的裏外交涉和辯證，卻提示了華夷秩序觀的裂變與轉換。儘管如此，華夷之界，依然常見於官方和民間的對外經歷，內化的一套注重文明程度與文化異同的表述。在異域紀行的經驗裏，華夷思維框架劃分的人獸之界、文明／野蠻之辨，產生相應的變稱如番、蠻、鬼，容易形成俯視、排外，文化的獨特與優越性的視角。^[3] 檢視此現象的當代意義，王德威倡導華夷風(Sinophone/Xenophone)，討論「華夷之變」，象徵著我們在思考華語文學與文化生成之際，境內境外的相遇與接觸，都混雜著身份、位階、主體／他者的異動和游移(王德威 2015；王德威 2018)。華夷風的概念闡發，讓我們逼視國與國、文化與文化相遇，尤其放在航路、行旅的文本觀之，傳統華夷觀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再畛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過程，打開了華夷思維和風土之間的歷史性參照。同時「風」可作為語言、風潮、教化、風土的整體理解，更是具體可感的季風吹拂。「風汛過時，年年不能抵廈」、「夏秋風颶，人船俱沒，數十年如是」(王大海 35)，這些古老的行旅者經驗，提示著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亞洲季風驅動的航行，充滿不可預測的風險、變化和貿易視野，但同時帶來族群、文化的轉移和互動，形成民族、語言和社會文化的多樣性。除此，王德威提醒「風」的研究，同時兼顧「勢」的詩學。如果前者代表「一種流向和能量」，後者則是觀照「一種傾向或氣性(disposition/propensity)，一種動能(momentum)」(王德威 2018: 19)。換言之，我們觀察行旅書寫，探究華夷風土觀，無非是在歷史性的風土脈絡裏，重新質問行旅者的主體立場、位置的設定與交換，以及在時間性的流動、積累、播散裏的軌跡，以其不可預測性。^[4]

華夷觀與風土的接觸，隱含著「風」的多重意義的解讀，我們藉此認識漢語文獻走入馬來世界，箇中文化進退與視角立場或顯或隱的變換。^[5] 從華語文學的脈絡而言，漢詩文和筆記的跨境寫作，是最初的境外漢語實踐，見證古典世界的裂隙與重構。海洋視域和路徑帶有「華夷風」視角的思考策略，檢視「華夷之辨」或「華夷之變」的可能軌跡，其實是一種文明、文化、語言的異質元素在漢語世界的碰撞、相遇與共存。

航道，因此是中國對外交通典籍的重要敘述，《漢書》記載了西元前漢朝的中國人前往林邑或扶南治理下的中南半島港口，必然是「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最早的南海航路，是由福建、廣東等南方人的「蠻夷」中心，在進貢與貿易脈絡裏搭異國船隻，跟海外蠻夷的接觸經驗（王賡武 1988: 28-30；Bowring 2020: 87）。東晉以降，《法顯傳》記錄高僧法顯往天竺的陸去海還經歷，歸來航道從獅子國（斯里蘭卡）經馬六甲海峽，中途短暫停留耶婆提國（蘇門答臘和爪哇之間）。^[6] 到了唐代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描述從廣州出海，沿著中南半島、馬來半島海岸行駛至新加坡海峽，接著分途，東南可往爪哇，向西則是出馬六甲海峽。僧人義淨《南海寄內歸法傳》紀錄西行求法兩度停留室利佛逝國，學習梵文，六年餘時光描述了蘇門答臘的風土景觀，也去了馬來半島的古國羯荼（吉打“Kedah”的原名）（鍾錫金 1993）。宋代以後，中國的航海和造船技術有了重大改變，趙汝适《諸番志》、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宋代中國與阿拉伯地區（大食）之間的航路。元代泉州汪大淵乘商船出海，《島夷志略》記載他途經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橫渡印度洋到阿拉伯、埃及。南洋群島都在他遊歷範圍。明代鄭和下西洋的隨行者著述——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提供了更多南海航路上的國度訊息。南海航路又可分為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張燮《東西洋考》總結舟師水手經驗，精確提出「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張燮 102），爾後地理文獻多延續此一說法。雖然明清海禁政策反覆，但南海航道已是海商、使節絡繹於途的貿易與外交之道。歷來史錄或抒懷的史書、遊記、筆記、日誌、詩文等著述，難免有其寫作上的虛實，以及轉錄或實訪經驗的差異。^[7] 但中國人從海灣進入海峽，最後進入海島時代的航道進路，建立其認知南海世界的歷程。這悠遠的海上航道，隨著朝貢貿易體系的建立，以及航道的擴展，被稱為「海上

絲綢之路」。^[8]

在大航海時代，西歐海上帝國的東渡殖民，始於十六世紀的香料貿易。從葡萄牙一五一〇年佔領印度果阿，隔年入侵香料貿易的集散地馬六甲，正式開啟西歐在「馬來群島世界」的殖民時代。一五二二年葡萄牙在摩鹿加群島建立碉堡，直接涉入香料生產地，葡萄牙轉賣香料的生意，供應中國、印度、阿拉伯、歐洲的市場。葡萄牙獨霸的局面，很快引來荷蘭人的進駐。一六一九年，荷蘭人正式佔領爪哇島的巴達維亞，壟斷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貿易。一六四一年更奪走了葡萄牙佔領的馬六甲。這段期間，西班牙和英國人也先後東渡加入這段東方海域的國際貿易爭奪戰。一五六七年西班牙入駐馬尼拉，英國人則於一七八六年登陸檳城，新加坡則遲至一八一九年開埠，以及一八二六年海峽殖民地的設置。殖民城市與港口的確立，印證了從南海至馬六甲海峽航道上的繁榮景觀。這條東亞航線與印度洋航線交會的馬來海域，就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開端（李伯重 67-85）。

在海洋貿易的網絡上，福建人的船隻很早就往返穿梭馬來海域，尤其馬來世界的幾個核心港埠，諸如蘇門答臘的舊港(Palembang)、爪哇的萬丹，爪哇以東海域的望加錫(Makassar)和帝汶(Timor)，暹羅南部的北大年(Patani)，採買香料、藥材，進而引入華人移民人口。海盜鄭芝龍的船隻往返日本長崎、福建與馬來海域，帶來頻繁的海上貿易。爾後抗清的鄭成功集團也控制著福建、粵東與馬來海域貿易線。一六六一年清廷頒佈的禁海遷界令，鄭成功奪取荷蘭人在臺南的熱蘭遮城，進而一六六四年退守臺灣。此後福建船隻幾乎往返東南亞各處，南洋貿易顯得更重於中日貿易。^[9]

在「馬來群島世界」的貿易與殖民時代，馬六甲、巴達維亞、新加坡、檳榔嶼等幾個重要海港城市的開埠，大批中國海商、苦力、移民南來，構成華人、馬來人、南島語族、洋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雜處的社會，展現了我們認知與辯證華夷交織的歷史脈絡。漢語寫作的詩與筆記、日記組成的南海印象，藉由描述和記錄鋪陳了航路與「馬來群島世界」的文明與風土。若進一步參照最樸素的歷史檔案，巴達維亞吧國公堂（吧城華人公館）留存下來的《公案簿》，就能看出唐番通婚、私通、入伊斯蘭等事件引發的種種糾紛和法律仲裁，以及吧城唐人的漢語語言裏，夾雜著許多馬來語、荷蘭語、印度語等外來語的成分（劉永連 220-244）。這些馬來世界裏的漢

語文獻，鋪展了歐洲、阿拉伯世界、中國群體移動帶來的視野轉換，知識建構和生存體驗。我們藉此觀照一個中國境外的華人、華文世界的生成，種族與文化的境內境外的相遇與接觸。作為實體與符號的馬來世界，內嵌於漢詩文和筆記，折射出十八世紀以降華人生存於此的風土感受，以及文化生產的眼光。

貳、走入武吉士人的海

今日東南亞海域內的國度，有其自成體系的悠遠歷史航路。在公元三、四世紀，從南海、爪哇海和稱為「香料群島」的摩鹿加群島之間的馬魯古海，早已發展出南島語系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Malayo-Polynesian)和文化。他們活躍的海域範圍，相當於我們稱之為“Nusantara”的「馬來群島世界」。這個詞彙最初指向十三世紀以爪哇島為根基的滿者伯夷(Majapahit)政權，其統轄爪哇之外眾多島嶼的勢力範圍。在今日的狹義解釋往往聚焦於印尼群島。^[10]

但回顧海洋貿易與文化生成背景，「馬來群島世界」其實有更廣闊的意涵。^[11] 連接幾個古代政權的海域，揭序了直達中國、印度、非洲、歐洲和中東的航海貿易。然而也因為香料群島聲名遠播歐洲，直接導致歐洲殖民勢力的東渡，終結了「馬來群島世界」的海洋貿易領先地位。近年有的東南亞史學者以“Sulu Zone”來探索環繞蘇拉維西海(Celebes Sea)和蘇錄海(Sulu Sea)之間的海域文化，突出「區域」(zone)不僅是一空間概念，同時是歷時性的過程，作為理解內部的文化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下，族群形塑與再形塑過程(Warren xxv-xxxix)。有的學者則創造「馬來群島世界」的概念，擴大馬來群島的海域邊界，詮釋這片亞洲群島曾扮演的全球貿易角色，南島語族的貿易網絡，以及他們遭遇印度、阿拉伯、波斯、歐洲影響甚於中國的歷史痕跡(Bowring 2019: 1-6; Bowring 2020)。

在中國的南海交通史，朝貢貿易體系基本作為解釋南海航路的框架。無論是貿易或外交，從中國到印度洋的航路，決定了南洋古國的興衰。^[12] 南宋期間的《輿地圖》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海上交通路線地圖，地圖繪有印度、閩婆、三佛齊，以及南海一些島嶼，可以說是將漢以降往斯里蘭卡、印度航道經過的馬來群島世界納入視野。鄭和下西洋（一四〇五～一四三

三)後的兩百年,《鄭和航海圖》出現在茅元儀的《武備志》(一六二一),一幅中國遠洋航海圖以手卷式長圖,更詳細完整的紀錄了南海航路上的馬來世界國度與位置,作為鄭和下西洋航海實踐的唯一地圖實證(梁二平 113-135)。明清兩朝都曾實施海禁政策,沿海地區海商的出航經驗,直到清朝水師提督施琅之子施世驃根據海洋地理資料繪製的《東洋南洋海道圖》(一七一二~一七二一),清楚標示往越南、印尼、柬埔寨、文萊、菲律賓的航路地圖,以及針路、更數。航海圖代表著境外視野的建立,以及主權之主張。南海的中西航路,牽動的是東南亞諸國的經濟和政治變化。

然而,十八、十九世紀以後當中國使節和海商再次走向南海航路,朝貢貿易體系已因為西方殖民勢力的東渡而消失。荷蘭、英國建立的東印度公司貿易體系,以及殖民地管理秩序,徹底改變和重新形塑中國人的南洋視野。而在西方殖民帝國之外,他們接觸的「馬來世界」(Dunia Melayu),^[13]多元民族的海上貿易,尤其武吉士人在七月至十月間從望加錫,東婆羅洲的馬辰、帕西等地駕著武裝帆船來到馬六甲交易,武吉士人船隻基本主導了東印度貿易的關係網絡。^[14]因而種族、貿易、物產、習俗等異域見聞構成的「風土觀」,以及海上秩序的認識,讓走入南洋的中國人,重新經歷著經驗與知識之間,關於華夷視野的微妙轉換。

從東晉《法顯傳》到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中國典籍不乏對爪哇、蘇門答臘等馬來世界群島較為細緻的地理氣候、物產風俗的記載。明代隨鄭和出洋的隨行官留下的紀錄有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二書,對爪哇、舊港國的描述更為詳盡。其中以費信勾勒的風土圖像較具文學性想像,留下形象化,卻不乏華夷辯證、具體可感的爪哇島及其人種的描述:

古名闍婆,地廣人稠,……舊傳鬼子魔天,正於此地,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即此地也。……番兵百萬餘眾悉皆敗走。遂已登岸,隨殺隨入,生擒番人煮而食之,至今稱為中國能食人也。獲囚酋長歸國,服罪放歸,改封為爪哇國王也。欽遵我朝皇上,遣正使太監鄭和等,節該齋捧詔敕賞賜國王、王妃,及其部領村主民下,草木咸受天福。(費信 23-25)

除了筆記體的記敘，轉換為題詠的詩句，更突顯其「異域」風土修辭：

古是閩婆國，曾遭鬼母殃。震雷驚石裂，深穴見人藏。歡忭皆知異，扶持眾立王。人民從教化，罔象被驅亡。婦女誇家富，男兒縱酒強。鸚歌時刷翠，倒掛夜分香。婚娶吹椰殼，人隨禦竹鎗。田疇禾稼盛，商賈貨財昌。洲上獼猴聚，溪邊祭祀忙。蠻夷遵聖詔，永世沐恩光。（費信 26）

這裏的風土記錄，既有獵奇，也不乏想像，當然是既定天朝眼光下，蠻夷稱臣，歸順朝貢的華夷風土觀。透過這樣的風土觀照，南海諸國形貌見諸於紀錄，在知識和想像兼備的引導下，總難掩其文化與地理上優先置入的中心／邊緣、華／夷的兩極架構。然而，在兩極對立的潛在視域之外，爾後更多境外行旅經驗帶來在地觀點與生活風土的介入，難道沒有帶來知識和敘事隱約的位移和修辭變化的軌跡性(trajectivity)？換言之，當我們關注更多屬於既有框架的主觀性或客觀性差異時，單一或侷限於中心／邊緣、華／夷元素的對應，反而限定及忽視了探索的軌跡。^[15] 如何從系列的文本、行旅經驗裏窺見箇中思路發展和眼光變化，以及細節在不同文本間的關係，看待旅程的「軌跡性」，探究「中心／邊緣」、「華／夷」之變的辯證過程，尤其關鍵。

十八世紀以降系列聚焦於爪哇，尤其巴達維亞的寫作，有實地寓居經驗的記載和敘事，可以看做對南島風土與知識掌握的變化。^[16] 這些在清代乾隆年間的著述，包括程遜我《噶喇吧紀略》和《噶喇吧紀略拾遺》、陳洪照《吧游紀略》、王大海《海島逸誌》、顧森《甲喇吧》、佚名《開吧歷代史記》，以及十九世紀陳乃玉《噶喇吧賦》、闕名《葛刺巴傳》等，打開了一道南島風土或風景。歷來王大海《海島逸誌》和作者佚名的《開吧歷代史記》最受到關注。^[17] 這類文本對在地觀察與風土的把握儘管不乏錯誤的敘述，但知識的描繪和勾勒提供了值得比對參照的視野。本文透過王大海《海島逸誌》的個案文本，檢視箇中對華人遷徙與落地生根的現象，島嶼異族習性的描述與判讀。這尤其涉及南海航路上透過華夷之辨展現的種種風土、地理與人文世界的掌握。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福建龍溪人王大海（字碧卿，號柳谷），

隨商船泛海至爪哇島，居住在吧國（雅加達），後居三寶瓏(Semarang)、北膠浪(Pekalongan)等地，入贅於華人甲必丹家，擔任塾師。他在爪哇居住將近十年，衣食麗都，侍婢數十，然而，最終以家有老母，在乾隆五十七年拂袖而歸，回到故鄉，以教書度日。而旅居爪哇的種種見聞和經歷，則見諸於一七九一年完成的《海島逸志》一書。此書則要到一八〇六年，始有漳園本刊印問世，但考證書中所敘歷史事件，此書問世應介於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六年間。^[18]

王大海的經歷和寫作相當獨特，個人長期的寓居經驗尤其重要。^[19] 無論是親身見聞，或博採傳聞與在地知識，《海島逸志》在民族風土、自然地理、物產人情，以及奇譚怪事，風尚習俗都有細緻又別具趣味的紀錄。此書分為「西洋紀略」、「人物考略」、「諸島考略」、「山海拾遺」、「聞見錄」和「花果錄」共六卷，其中「西洋紀略」、「諸島考略」、「山海拾遺」三卷最能看出旅居「馬來群島世界」的異域風土和華夷思辨。^[20] 漳本有幾篇序言，不乏「聖朝聲教飄飄乎」、「憫時病俗之意寓乎其中」等堂皇溢美之詞，但作者的自序言明：「所見所聞，及其方土人情，與夫一言一行之可傳者，悉表而出之，以為正人心、扶世道之小補乎！」^[21] 換言之，域外的采風問俗，潛在的視域是進入風土，並以教化為準則。

因此，王大海最後離開旅居多年的三寶瓏返鄉，評價此荷屬殖民地的華人甲必丹體制，以及「華人贅婿」的風俗，不忘描述愜意、閒適的生活節奏和型態：「奴婢百十人」、「夫婦攜手而行……攬臂狎抱，風俗如斯，不知顧忌」、「奴婢持傘障日……服事於左右」、「食與臥最重，雖有急事，不即通報」、「一日如兩日，一世如兩世矣」等（王大海 20-21）。然而，此等帶有富奢或市民階級的樂趣，放在殖民地的巴達維亞，讓人印象深刻，卻又提醒我們探究背後的脈絡。但作者僅以華夷視野的比較，作為風土觀照的總結。

〈三寶瓏〉

西洋為極樂之地、然必須家無父母，終鮮兄弟，無內顧之憂者，方可終為極樂之人。中華之樂，蓋有禮義專取以相維，不能極其欲也。西洋之樂，則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而窮奢極慾，以自快其身心而已矣。（王大海 21）

在下西洋的語境內，禮義廉耻成了在爪哇島國判別華夷風土的標準。這略帶教化的說法，倒是替他歸鄉的抉擇：「家有老母，但作南柯一夢，扶袖而歸，猶棄敝屣」做了極佳的道德示範。這提醒我們不能忽視，康熙乾三朝海禁政策反覆不定。^[22] 黃遵憲〈番客篇〉描述下南洋的移民處境：「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鱷」、「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鑊」（黃遵憲 135），恐非虛言。王大海一七八三年出洋，一七九二年歸國，其時海禁鬆緊不明，他的南洋紀聞以「夷夏之防」為自己設下防火牆，也不足為奇。

然而，透過華夷立場標示自己歸鄉的理由，不能略過行旅經驗和寓居風土背後，南島和海域體系對個體自我變化的參照。王大海旅居爪哇時期，正值荷蘭東印度公司轉向衰頹。荷蘭於一六一九年征服雅加達，改名為巴達維亞，一六四一年攻陷葡萄牙佔據的馬六甲，進而掌控馬六甲海峽航道。十八世紀是武吉士人武裝帆船縱橫東印度海域的世紀。^[23] 直到十八世紀末荷蘭軍隊佔領廖內群島，駐紮於此的武吉士軍人竄逃至婆羅洲、蘇門答臘、馬六甲海峽一帶。接續英國人來到馬六甲海峽，建立檳城，從荷蘭手中取得馬六甲，此時海上秩序陷入混沌狀態。王大海就是在荷蘭、英國海上勢力消長交替，既無法擊敗對方，卻也無法建立海上新秩序的時刻，走入了武吉士人的海域。西方勢力讓此地固有的舊秩序解體，而武裝帆船裏的武吉士人以傭兵、商人與海盜形象出沒，正是海上混沌時代的產物。^[24] 在此意義上，王大海由南海航路進入爪哇，首要認知的對象，是武吉士人海上周邊建立的南島語族和政權，以及大陸生態，更遠甚對荷蘭與英國殖民政權的掌握。

王大海對南島文化與風土的認識，「諸島考略」有清楚的記載。該專輯記錄有二十四條目，〈西北諸島考略〉再細分六條目，共有三十餘島嶼的物產風土和生活其間的南島語族和混血民族後裔被細緻描述。這是南島語族世界，自蘇拉維西海，西至馬六甲海峽北端，橫越孟加拉灣，進入斯里蘭卡。這裏搭建的島嶼世界，基本是奠基於「馬來群島世界」自成體系的海域經驗，以及經由馬六甲航道進入印度洋的海路視野。

透過國別與島嶼的逐一記載，王大海《海島逸志》對爪哇海域周邊展開的諸島考略，有別於過往中國交通典籍裏的航道視野，^[25] 而是透過海洋的島嶼支點，系統性經水路，捕獲每一地方風土。西洋殖民者的貿易航路，

以及南島語族的水路習性組裝了這片海域的軌跡。儘管每地記載長短不一，詳略有別，王大海鮮明的追索、採集風土意願卻清晰可見，敘述不忘標誌「華人未有到其處，所以未能詳其風土耳」（王大海 84），顯然著意替風土建立知識框架。若對照康熙年間頒佈「禁南洋貿易令」（一七一七年），清臣藍鼎元以〈論南洋事宜書〉（一七二四年）主張開放海禁，詳述「南洋諸番，不能為害」的各種理由，王大海南島寫作關注族群人種接觸的脈絡，就更有意思。藍鼎元跟王大海同樣來自福建，對海外知識的接觸與認識，讓他的視野不囿於大陸眼界。但藍鼎元從海防面向，試圖解釋諸番不足為患，理由如下：

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為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一教，亦被西洋佔奪，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遭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尚心痛首疾。南洋數十島番，則自開關以來，未嘗侵擾邊境。（藍鼎元 1995: 55）

在這種「倭寇」記憶和「備倭」框架下去認識與解釋西方國家的海上殖民活動（李恭忠 171），雖展示了對西洋諸番的局部認識，但欠缺對西洋商業殖民主義的地緣政治理解。當然，背後依然有夷夏之防或華夷之辨的話語脈絡。^[26]

相對於藍鼎元，數十年後王大海實地寓居的風土觀照，呈現華夷雜處共居的現象，顯然就有一種華夷話語位移的軌跡。他在描述南島文化以前，先張揚「和蘭」、「紅毛」、「和蘭西」條目，再細述南島民族分布生態。洋人、華人、南島語族並置來看，無關國別，而是觸眼所及各路族群共生共存的現實風土。在洋人殖民者來到爪哇以前，南島語族和華人已是世代居住者。他判讀荷蘭人如何得以殖民：「爪亞性愚蠢坦率無謀，又貪其利，遂為襲破萬丹，併取吧地」，又言及荷蘭人「分而治之」及律法嚴明的政策：「華人並各種番人皆設以甲必丹，使其自申約束。唯大罪及命案皆送付和蘭憲治，其創立法度，謹慎嚴明，所以能久遠也」（王大海 50-51）。

表面上，王大海看爪亞、荷蘭人的地緣關係，突顯被殖民現象裏的階

級、文化實況，但不能忽視「爪亞之人數倍於和蘭……畏懼和蘭，聞其名則合掌，主僕之分嚴明，見其主人必屈膝合掌」的習性（王大海 30），王大海指出了他們雜處山谷間種稻種粟的民族性風土特質，長於農耕並周旋於自然。這裏的華人視角，固然不脫殖民主義下群島地緣政治的觀察，但出自風土的觀照和關懷，反而在華人族裔高度裏，暗示著華夷視點是多種政治權力交錯下，人種與地方之間關係位置的參照。華夷立場不是固定的對立和二分。

王大海紀錄南島海域所見的洋人，箇中的華人位置，總是跟周邊風土發生聯繫。諸如談英國人殖民檳榔嶼，不忘強調「其立法苛刻寡恩。華人有在其地者，皆遷徙他處」(54)。談佔領馬尼拉的「寔班牛」(西班牙人)，認為「其狀貌頗類華人」，同時又說「飲食器用略同和蘭」，最後總結西班牙人採買西洋布販售至吧國，「資本極大，華夷均負其責(債)」(56-57)。我們注意到，這裏勾勒的華、洋、夷，共同交織的風土脈絡，離不開殖民與貿易。這片馬來海域重新定調了華人參與其中的地緣關係，平實且平行交錯各路人種的在地脈絡。這是彼時藍鼎元提及閩廣百姓「欲富所驅，盡入番島」(55)，卻欠缺的在地風土認識。王大海的觀察同時觸及人種的在地繁衍：「其吧產者，髮不紅而瞳亦黑，地土使然也」(51)，這是荷蘭人與當地人通婚的後裔，已然帶有風土孕育滋養族群人種特徵的論調。

從海域生態與民族系統，王大海為南海各島國勾勒形貌，記錄風土民情，隱約標示華、洋、夷交集的風土脈絡，似在建立漢語書寫的「馬來群島世界」譜系。他是志在采風，抑或旅居爪哇十年形塑的風土觀，已是潛在的生活視野和地方感？他追索風土孕育的不同族群歷史，敷衍印象式的人文地理，這不全然是一套傳統的「華夷之辨」。王大海觀照「華夷之變」，應屬他從巴達維亞的殖民與南島文化中滋養的在地目光。

荷蘭人佔領的巴達維亞是一典型的殖民城堡市鎮，但不脫當地原住民港口市鎮的特色。荷蘭人、華人、亞洲基督徒共同居住城牆內，沒有嚴密的藩籬，他們受到當地數量龐大的奴隸服務，而這些奴隸來自印尼群島和印度半島。而在內陸地區，荷蘭東印度公司更集中安置來自周邊島嶼的原住民族，看上他們驍勇善戰的民族特性，以作為一支潛在利用的武裝力量，調動到各島作戰。而巴達維亞承襲自雅加達港口城鎮的傳統特色，作為統

治權利的核心，更與爪哇海域的鄰居有頻密的外交接觸，以及使節來訪。然而，十八世紀末的巴達維亞卻陷入一種沮喪與消沉的氣氛。熱帶疾病和傳染病在城市蔓延，中國的帆船貿易也在消退。中國商船更集中於馬六甲海峽的港口貿易，因此從馬六甲海峽到爪哇島東邊的水域，匯聚了印度、馬來人、華人、武吉士人、伊朗嫩人(Iranun)的貿易商、走私客和海盜貿易。^[27] 以上種種大環境的變化，可以看做王大海描寫爪哇海域及周邊世界的立基點。而他如何看待掌握統治權力的洋人，進而描述散居與自成格局的南島民族，成了我們觀察這位旅居爪哇的華人的「馬來群島世界」世界觀。

參、華夷風土的接觸地帶

在歐洲殖民勢力以及南島民族秩序交織的海域，王大海對噶喇吧（巴達維亞的音譯 Kalapa）的描寫，陳述了各民族混居，以及民族特性的對比。從華人視角出發，中國海商在吧國貿易，形成移居傳統，當地僑領被任命為甲必丹，在他筆下做了簡要的記載：

〈噶喇吧〉

我朝德澤遠被，四夷賓服，不禁通商。鼓掉揚帆而往者，皆閩廣之人。自明初迄今四百餘載，其留寓者，生齒日繁，奚止十萬之眾。

吧城連衢設肆，夷民互市，貴賤交易，所謂利盡南海者也。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而納賄和蘭，其推舉有甲必丹、大雷珍蘭、武直迷、朱葛礁諸稱呼，俱通稱甲必丹。華人或口角，或毆，皆質之甲必丹。（王大海 2-4）

其中「我朝德澤遠被，四夷賓服，不禁通商」秉持天朝視野，儼然一幅文明移居，商賈階層和管理制度井然有序的華人社會。然而，南海世界的現實環境是西洋帝國殖民和異族雜處。所以「夷民互市，貴賤交易」，也就客觀陳述了華人在南洋島嶼進行商品交易的生活風土。華夷混居有其悠遠的生活脈絡，甚至形成了在地化的移居群體。華商因而致富，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舟〉本另有文字：「衣其衣，食其食，讀其書，與爪亞同風俗，而下視爪亞，自稱曰息柁」（王大海 4）。根據考證，息柁即伊斯蘭

(Islam)，換言之，「夷民互市」背後，揭示了一群早已皈依伊斯蘭的華人群體。相近的文字，也見於「諸島考略」的〈息坭〉。他們的生活起居和信仰，跟當地南島語族無異，如同以下的具體描述：

〈息坭〉

華人有數世不回中華者，遂隔絕聖教，語番語，食番食，衣番衣，讀番書，不屑為爪亞，而自號曰息坭，不食豬犬，其制度與爪亞無異。日久類繁，而和蘭授與甲必丹，使分管其屬焉。(王大海 61)

這些華人衣食、語言、信仰已入鄉隨俗，同化為當地人一體的生活秩序裏。然而，「其制度與爪亞無異」卻又「不屑為爪亞」，顯然在異國土地上，人種的現實階級差序和宗教習俗，仍糾結著族群自我和他者的辨識。但這類人日久類繁，卻是殖民者分享權力，授與甲必丹的群體。這揭示了華夷接觸的風土，另有值得關注的華人入伊斯蘭，及唐番通婚脈絡。這些記錄的「息坭」，是作為新客的王大海的在地知識，就「華人」的認識意義上，而有了深一層的華夷意識的微妙轉換和挪移。

根據《公案簿》記載彼時的華人糾紛，華人與伊斯蘭（失坭）矛盾顯得日常。案例裏可見華婦乞養番子，番子可不依「失坭成規」，即不必皈依伊斯蘭。但也有唐番婚姻案例，華婦「不願歸唐人」、「甘願入失坭」，或再婚者入失坭，都被公堂以「背籍改姓、玷辱祖宗」訓斥，強調「唐番人等宜各守其道，免致亂籍，以傷風化」，甚至包括華人寡婦與番人通姦，公堂裁決其喪失子女撫養權，「免被伊母付入失坭」(劉永連 221-222；聶德寧、侯真平、包樂史、吳鳳斌 53-54)。更有意思的判決，還包括遭遇家暴的華婦申請離婚，但前夫則以華婦將來若改嫁唐人，自當願意，若改嫁番人則不願。公堂最後准予離婚，但卻議決「改適番人，可捉拿報知」(包樂史、吳鳳斌 2002: 183-185)。以上涉及伊斯蘭，以及婦女跟番人婚配的種種矛盾，突顯華人與當地土著的藩籬，以及華人堅守的血統意識。然而，唐番通婚的狀況依然發生，雖在一七八八年的前數年，土庫出示，不許唐番通婚。但通婚是社會人情交際、融合過程的環節，甚難避免，尤其華人與出身婢女的當地人非正式登記通婚。另一相近的描述，可見顧森《甲喇吧》

遊記。此文跟《海島逸志》的寫作相隔幾年，記錄華人「新客」抵達巴達維亞時，當地婦人攜女求售的場景：

女子嫁唐人，得免賦；故船至時，常有老嫗携幼女，艷妝求售，所費甚廉，惟不許携婦耳。（王大海 187）

華人以當地女子為婢，蓄奴成風，與其通婚或生有子嗣亦不在少數。這是華人記載裏的南島女子跟華人通婚現象。而在洋人的紀錄裏，這些土人妻妾在主人逝世後，其最鍾愛者得獲自由身，列為正房，兒女被認定華人。^[28]由此看來，這些華人與南島女子的婚配，無論是正式登記或私合，突出了一個我們需要理解的華夷交織的文化背景。

這群自號「息歪」的華人或華夷混血後裔，其實突顯了一個在馬來世界世代移居扎根的華人融入為土著的環節，可視為土生華人(Peranakan)的濫觴。王大海視其為南島族群的一分子，且注意到安汶、萬瀾（班達群島）就是色仔啤（葡萄牙人與土著混血後裔）、息歪、無來由並居（王大海 79）。華人與番人之間的界線，如同我們從《公案簿》看到的各種案例，既矛盾又融合。王大海從南島風土裏發現的「華人自我」，在蓄奴和通婚脈絡裏，多了一層對南島語族的他者參照眼光。

在當地華人婚姻裏，還有入贅習俗。王大海自身經歷就是入贅三寶壠的甲必丹家，並自陳「風俗重華人贅婿，吧產不屑也」（王大海 20）。陳乃玉〈噶喇吧賦〉另有補充：「十有七家，招夫贅婿；千而萬鼎，釀蔗成糖」（王大海 191）。其時華人幾乎獨佔蔗糖業重要市場，^[29]華人南來新客男性貧困入贅女家，自然是富裕人家。王大海的際遇和書寫，指出自身的華人視角來自富裕華人階層，家裏蓄奴或以奴婢為妻妾司空見慣，背後反映了一個與荷蘭殖民者共享的資產階層視野。再者，入贅風俗不無可能受到爪亞、蘇門答臘當地母系社會習俗的影響。「生女為貴，贅人於室，生男則出贅於人」（王大海 30），這是王大海注意到的爪亞風土，亦顯示出華人與當地母系氏族交融的生活面向。

《海島逸志》記載的爪亞人形象負面，那是因為在荷蘭殖民體制內，爪亞人往往是奴僕、奴隸的身份。^[30]這層眼光的判讀，根源於王大海處身於甲必丹家族，華人從商以及成為殖民制度內的地方領袖，形塑的華人觀

點，墊基於華人與荷蘭殖民者在經濟上的合作關係，以及在地方和族裔管理被賦予的行政權力。

一六一九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委任福建同安人蘇鳴岡為首任甲必丹(Kapitan)處理華人事務，一六三三年增設雷珍蘭(Luitenant)共同議事，一六九〇年設有武直迷(Boedelmeester)為財產管理官，一七五〇年再設置秘書議事，稱朱葛礁(Secretaris)。以上是華人社會裏公堂理事會的核心成員組成，開啟了公堂同堂議事之濫觴。一七四二年成立吧城唐人公館，那是正式的唐人議事廳，屬荷蘭東印度公司管轄並委以唐人甲必丹根據唐人律法和習慣管理華人內外事務。以上理事人員的產生，皆屬荷蘭東印度公司指定任命，其中升遷與任期，尤其甲必丹與雷珍蘭為終身職，顯然任職者皆須有殷富家底。這也成了王大海判斷華人「納賄和蘭」的現實根據。從經濟關係看來，在紅溪慘案以前，吧城基本可看做荷蘭人保護下的華人殖民城市(包樂史 1997: 61)。而在華人大屠殺以後，在殖民者制訂的管理制度裏，唐人公堂裏有效的處理民事糾紛，讓華人的生存與生活秩序納為社會體制的一部份(包樂史、吳鳳斌 2002; 包樂史、吳鳳斌 2002a)。換言之，華人、洋人和南島土著處身的社會語境，提醒了我們注意王大海「華人」視野的侷限和偏見，但又讓王大海可以在非勞動的生存條件下，走向更開闊的南島語族的採風紀錄，遊走洋人與土著之間。

在勾勒荷蘭人和當地土著的歷史相處經驗，王大海又如何鋪展洋人「以夷制夷」的現實脈絡，藉此突出個人「華」的立場與處境？尤其涉及荷蘭人的管理與風俗，王大海判斷他們「冠乎諸夷之上」，其敘述的準則見諸於他對當地南島語族風俗文化的先入為主的貶抑，以及對洋人的推崇。

〈噶喇吧〉

吧國地本爪亞，(〈舟〉本作「吧國遠近各島之人，本皆爪亞一種，俗尚質樸，性愚蠢怯弱」)，和蘭設計龍絡，納其租稅，施行號令，設立法度，盤踞海邊之地，徵課稅，給文憑，慎出入，嚴盜匪，管束諸夷。其人隆準赤髮，沉潛善慮，所以能冠乎諸夷之上。(王大海 2-3)

這裏的荷蘭人形象，「隆準赤髮，沉潛善慮」，而散居爪哇和周邊島嶼

的南島語族，在殖民政策的種種管束措施下，都是「俗尚質樸，性愚蠢怯弱」。他將土著次等化(subalternization)，複述地方性刻板印象，近於民族本質主義的判斷。

王大海接受並合理化了荷蘭人優於南島語族的事實，然而，卻又同時張揚華人視角，從中華文化傳統禮儀制度的「五常」，對荷蘭人展開批判。

〈噶喇吧〉

至於和蘭風俗，未免掩耳盜鈴之弊，揆之於理，五常之中，無一存者。上賊其下，肆行貪酷，非仁也。夫妻反目，聽其改醮，死未遇月，由其他適，非義也。長幼無序，男女混雜，非禮也。窮奢極慾，以終其身，不省燕翼詒謀之道，非智也。惟信之一字，其或庶幾乎。(王大海 5)

他評價非仁非義非禮非智的荷蘭人，唯有信用堪可表揚，畢竟華商眼中，貿易是他們接觸荷蘭殖民者的最關鍵交際管道。王大海站在的文明高處，持守的依然是傳統華夷之防的立場，揶揄荷蘭人之風俗，恰恰也是洋人民風之日常。這一切反而突顯人種、文化在「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的複雜意義(Pratt 9-11)。這是瑪麗·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著名理論，討論南美洲在殖民脈絡下的行旅書寫，以及提出為帝國服務的書寫，如何建構知識和想像，「不斷向自己呈現並再現其邊緣及他者」。她指出「接觸地帶」，就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衝突、格鬥的空間，且表現在非對稱的支配與從屬關係」(Pratt 5-9)。然而，我們在此處重申「接觸地帶」，旨在引導我們思辯，海上航道構建的馬來世界引來了華人、歐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他們在此相遇接觸，以及產生的各種文化、制度、宗教和語言的碰撞、磨合和妥協，產生的文化交織與互動現象。換言之，我們不側重在非對稱關係，並轉換了普拉特的原初「接觸」視角——在不均衡的權力關係裏，討論主體與他人關係的構成。這是從殖民權力或文化高處往殖民地邊緣流動的知識生產。但我們關注馬來世界的「接觸」，強調遊走在主要殖民城市與邊緣島嶼之間，更能突出各方遭遇互動，以及遭遇的空間。那是一個人與環境發生聯繫的空間。從「接觸地帶」的框架思考王大海的行旅書寫，追問的不僅是「接觸」，還包括書寫的「變化」。書寫本身不僅

有來自中華帝國知識的進駐，卻無法忽視「地方性知識」帶來的實踐。文化是相遇的歷史，建立在對南島邊緣世界的觀看，以及生活在殖民城市（吧城、三保壠）或殖民地代理人（甲必丹家族）的王大海，從內部形塑的殖民地知識視野。兩者知識的交織，就是馬來世界的「接觸地帶」。

華人既周旋和生活於異族之間，王大海的華夷視點落在各島的南島語族，自然多了文明與文化意義下主導的觀察。諸如以下描述，不乏獵奇式描述其原生狀態的生活慣習：

〈噶喇吧〉

至於四夷風俗，怪形異狀，木處穴居，虬髮紋身，露體血食，駭異不經，又何足齒哉。（王大海 5-6）

〈暴暴〉

居於安汶之東，狀如夜叉，渾身漆黑。毛髮螺拳如艾，醜惡不堪。手足敏捷，上樹如飛。多木處而穴居，不火食。血如潑墨，性多喜酒。甲必丹高根官有一僕，尋之不見，以為逃也。……酸眠六七日，為人所覺，拖而出之，宿醉未醒也。和蘭喜蓄此種為僕，以其狀醜，便於出入。（王大海 69-70）

〈吉寧〉

吉寧與西蘭相鄰，狀漆黑短小，髮不拳而微虬，風俗略似暴暴。……余有一婢，狀頗端好，但其漆黑難看。西洋飲食，必群婢羅列左右服役。余每見則揮去之，內人戲謂曰，此古銅如意，欲與君搔癢耳，何見拒之深也。余為之噴飯。（王大海 73）

以上記述，可以看做爪哇周邊島嶼在地人種習俗的採風，但無異放大了異域情調，甚至藏有鮮明的文化優劣視角。荷蘭人蓄奴挑貌醜之土著，華人則戲謔膚色漆黑的婢女，這類玩笑，訴諸今日觀點如同文化霸凌。但也不應錯估十八世紀王大海華夷視野裏的描述，呈現的風土性意義。蓄奴養僕更多屬於殖民地洋人和華人階層的習氣，他們對南島土著的認知與接觸，既是生活環節，也是知識性印象。我們不必僅視其為一種民族誌的製作，而忽視因為經濟、文化的權力階級，以及城鄉差異造就的品味和趣味，形成王大海對南島土著作為生活聯繫的一環的觀照，甚至互動的樂趣。這

屬於中國人華夷視域下的南島語族，當然也是華人作為爪哇生活群體的一員，體現了對他族相遇而產生的自我與他者識別的軌跡(trajectivity)變化。

邊留久(Augustin Berque)對風土與風景的理論反思，提醒了我們「風土性」(mediance)的意義，那是人與環境的動態耦合，是從根本上構成人類動態聯繫中，這種關係的建立方式(Berque 2017: 88-93; Berque 2017a)。換言之，王大海的南島觀察和記錄雖然不乏文化偏見和盲點，但帶有「風土性」的跨文化接觸，華夷之辨不是「文化實踐」，而是在採風過程呈現一種屬於華夷的生態環境。無論是耳聞或走訪的紀錄，王大海在人居環境裏去重新界定華、洋、夷的動態聯繫，構建一個南島世界，應該是《海島逸志》為我們展示作為華人南島意識的馬來風景。這恰恰是我們討論風土如何在南島的在地經驗裏發生意義，尤其狀寫其生活形態與種族特徵，倒像第一手的人類文化學的觀察筆記，樸素，帶偏見，卻有一種存在的動態與連續性，在華夷的二元框架裏產生「變」的裂隙和可能。那是十八世紀華人對南島風土性的紀錄。

肆、風和島嶼視野

一九三五年日本學者和辻哲郎在《風土》提及南洋的風土性，指出儘管欠缺時間性的輪轉，但有空間性的推移。

雖然沒有季節的變化，但與季節相應的層層變化都包含在這風土之中。儘管缺乏「時間變化」，卻存在「空間變化」，能理解這點的人都認為，南洋的單調只是季節的單調，而非內容的單調。

(和辻哲郎 23)

和辻哲郎主張的人間性風土學，旨在強調人之存在的空間性、時間性結構的一種界定，並非自然環境對人的制約和影響，關鍵在於與人互涉的感知類型或結構。他指出風土是一種自我發現的機制，因而「歷史是風土性的歷史，風土是歷史性的風土」(和辻哲郎 4-18)。和辻的觀點，提醒我們關注王大海在《海島逸志》選擇的人與環境的觀察視點。他以水路接應，從島嶼到島嶼的連結，航路決定了空間的推進，亦在知識框架裏留下了分野的判準：

西洋澤國迂迴聯絡，窮極無際，有以帆檣通往者，方可略識。其處有以和蘭居守者，則為統轄轄地。其餘或木處而穴居，未常火食，赤身露體，奇形怪狀，皆不能盡識，亦無可考。(王大海 90)

這其實在展示一幅馬來海域視野，以荷蘭人佔領的殖民地現實，投映他的地理和風土觀照。荷蘭轄地與否的分野，固然是文明差序的判準，或知識框架的起點，但南島族人原生態的紀錄，風俗的採識，不也暗示一種知識視域的重構，以此作為面對洋人與土著的視線交織或調整？在「諸島考略」有十八則關於馬來群島各島嶼或人種的考察，另有六則外延至孟加拉灣的印度、斯里蘭卡等地。馬來世界的航路歷史，島嶼之間的空間性推移，描述了各處南島風俗的異同。相對十八世紀初期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僅著重水程紀錄和航道見聞，《海島逸志》多著眼南島的風土性，這個敘事視角，相應滿足了對馬來群島的知識性建構（既有博物色彩，亦有采問紀實），以及華人如王大海等輩在南島世界的逸樂生活。

除此，王大海論及吧國的氣候和時節，標題用了一個中國古代思想概念的〈五行〉(王大海 92)。在先秦思想，時空秩序的成立跟五行有關，五行說縮結了自然意象的金、木、水、火、土，有其自然性質，可以透顯至外在世界向度，亦可落實在內在生命意識。從落實於形—氣—神的脈絡，進而擴及氣和風的觀照，風在人身內外四周，風的意識帶動「風土」的討論(楊儒賓 2018)。楊儒賓提醒一個核心概念值得注意：「風土就是具體的陰陽，這組詞語是宇宙性的相偶性原理，是世界存在的構成因素。風土集結了，結構撐開，才有世界可言」(123)。生活世界與風土的關係因此連結，那是真正的世界。

當「風」的思想系統進一步指向社會性脈絡的「風氣」、「風俗」，^[31] 王德威倡議的「華夷風」，著眼華夷論述在當代中國內外引發的各方論辯，強調了「風」的論述潛力和張力。王德威主張華夷風，或「華語語系的『風』來回擺盪在中原與海外，原鄉與異域之間」，這是我們可以勾勒的「華夷風景」。王德威的申論，顯然意圖貼近一種文學與歷史的想像，將其放在《海島逸志》的域外遊記，恰如其分描述跨洋出境的「風土」。他特別標舉「勢」的詩學，「指涉一個空間內外，由「風」所啟動的力量的消長與推移」。更為重要的，王德威認為「勢」的觀照面，就是「無不通向實效發生之前或

之間的力道，乃至不斷湧現的變化」(王德威 2018: 19-20)。

從島嶼視點到「風」的多面向觀照，《海島逸志》考略諸島、拾遺山海，見聞花果、器物，無論勾勒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涉及風氣、風俗和風土的描述，都關注風土中養成的人種特質和類型，以及在海域世界內的變化和消長。王大海著眼馬來海域內的族群生存狀態——海盜橫行的海洋貿易世界。

〈無來由〉

無來由，其種類甚多，散居四處。……性狡繪反覆，多有劫掠。於海洋中者，巢穴處於吉利門、龍牙等處，內地所謂艇匪者是也。出沒無常，閩廣患之。其言語和蘭遵之，以通融華夷，如官音然。(王大海 62)

我們知道的「馬來族」或「馬來人」(Orang Melayu)，舊譯巫來由人(簡稱巫人)。在早期東南亞印度化的語境下，馬來人卻是如同爪哇人(Orang Jawa)、武吉士人(Orang Bugis)等，是眾多族群之一。廣義的「馬來族」，甚至指的是整個馬來語族群或南島語系族群。^[32] 根據王賡武的觀察，早於王大海寫作的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是中國典籍文獻裏最早記載「馬來由」為馬來民族，可視為第一個承認馬來人意識的中國人。但陳將整個群島的民族視為一個民族，也沒提到馬來語(王賡武 1986: 106-119)。王大海的進步，則是從風土梳理的脈絡裏，清晰認識到馬來人的多種分類，以及散居各處。這個觀察，甚至相較於一八五四年才到馬來群島考察的著名博物學家華萊(Alfred Russel Wallace)來得細緻。^[33] 另外，王大海突出了通融華夷的馬來語。這層跨越，已把握住南島族群之間語言流通與流動的現實。若從在地華人角度而言，華夷通融的前提，在於歐洲人、華人都基於現實的商業利益，大家透過最有利可圖和方便的方式進行交易與溝通。所以，馬來語「如官音然」，其實是一種「風」(phone)的認識。聲音作為馬來人意識，馬來人族群特徵的一個點，來自馬來海域跨洋交流的過程裏的風土結構。他編寫〈無來由〉材料時，刻畫的不純然是客觀現實意義，而多了一分華人南島意識內，窺見馬來人跟荷蘭人、華人交涉的殖民地環境裏，作為南島語的馬來語，如何取得了通用語的位置和價值。在眾多馬來人分類

和南島族裔間關注通用語，藉由貿易和伊斯蘭傳播，^[34] 馬來語因此成為區域語言。這是華人或中國人第一次意識到馬來語作為馬來世界強勢語言的文獻紀錄。

馬來語落實書寫，涉及聲與象(sound and script)，王大海另有〈銖匣〉描述番語和荷蘭寫字之不同。他著眼的是書寫工具，洋人用鵝毛管，土著用竹片削尖而書，且說明不同南島土著的寫字，各有自右而左或自下而上的差異。王大海的視點是洋番參照，而彼時馬來文用阿拉伯字體，他偏向了追索馬來語如何落實在書寫形式。由此而言，王大海的馬來語概念，既是聲音的捕捉，亦是帶有手作意義(handcraft)的寫字，如同他必須使用「銖匣」來音譯馬來語 tulis (書寫)。這是他以聲音貼近風土型態，南島土著寫字類同匠人(craftsman)，構成在地經驗的一部份。

王大海關於風土與風俗的寫作，其實頗接地氣。他在海洋尋找支點，島嶼是點與點的連結，海域間浮出的各島嶼、各往返交際人種，成為關注。南海的種族分布顯然複雜，而其中對武吉士人的描述，最是形象化與逼真。王大海看到的馬來世界，基本是十八世紀是武吉士人以武裝帆船縱橫東印度海域的世紀。作為最有勢力的南島語族之一，他們的海上足跡幅員甚廣，從新加坡到新幾內亞，從菲律賓南部至到澳洲的西北部，往往被認知為海上民族(Pelras 3)。王大海稱武吉士人為「武吃氏」，認為該民族強悍，再以數則見聞佐證其武藝高超，具有嚇敵效果。

〈武吃氏〉

武吃氏，居於望加錫，其魁處於山中，自稱督喏。其女子極美，且乖巧，能識人意。其族性強悍，剛猛異常，視死如歸。每揚帆海上，賊船過之，莫不辟易。不受和蘭節制，與盟約為兄弟相稱而已。(王大海 64-65)

〈武藝〉

余一婢，名掌珠，隨往馬辰，中途過賊，余倉皇失措，舟師曰眾寡不敵，奈何。婢云：事已如此，當共努力。余不知所為。婢云：無恐。持鎗而出，守於樓門不動。賊登舟擁至，婢以鎗揮之，立傷數人。賊退而相謂曰：何得有武吃氏之鎗法。婢叱曰：我即武

吃氏也，請再詳試之，賊懼而盡披靡。(王大海 147-148)

「武吃氏」的正面認識，突顯了社會性的風土意義，即風土與主體性的構成。王大海捕捉住武吉士人的悍風，這是南島族裔的精神記號，源自於他們是地區性的航海和貿易長才，是馬來統治者的傭兵，在區域戰爭裏被驅趕的離散經驗，形成冒險犯難的精神(Bowring 2020: 287-290)。

綜觀王大海對各南島族裔的片段印象描述，不完全是粗疏印記，而有展現華夷風土觀內的「文學性」，即是如何在修辭和敘事意義上接近人的存在方式與風土的關係。不論是〈武藝〉裏的悍風婢女，描述武敦人「狀貌醜黑，性強悍，視死如歸，諸蕃所畏懼，其剛猛不亞於武吃」、貓釐（峇里島）人「男女皆穿耳而大洞，女子頗有顏色，性勤儉作家」等等，這類描述不能簡單視為獵奇，或逕直解讀為俯視化外之民的眼光。

這類實訪性的遊記文本，在邊緣性的國度裏觀照與描述，觸及到了這個文類生產的特殊性。王大海在延續博物、採風的知識性填補之餘，恰恰做為邊緣性行旅經驗的產物，他製作了在邊緣知識內，另一種「風土」面貌。雖不脫華夷觀照的視域，卻經歷著一種在地經驗介入後的「以地域為本的想像」(place-based imagination)。這是德里克(Arif Dirlik)提出的論述，反而促成了我們思考知識生產與風土政治的脈絡(Dirlik 1999)。

《海島逸志》記載異域風俗，不可忽視馬來海域內文化相遇過程的多元性。他記錄帶有民間傳說色彩的〈飛頭〉(馬來女吸血鬼 Pontianak)、〈製毒〉赤腳蕃用毒狩獵、〈酣贛〉刀槍不入的草根宗教；也記錄山海怪異見聞，如〈海和尚〉海上幻影或人魚、〈尿婆〉形如婦人的海鳥、〈山客〉山林野人、〈有尾番〉長有尾巴的紋身土著等。以上擇要舉例的風俗顯出新奇怪異，也是異文化接觸裏，對南島文化的「風土性」對視。王大海處理在地風俗裏的跨文化交織，亦有面對外來器物和技術的觀察，諸如〈和蘭醫〉處理腐瘡的外科手術、〈圓餅銀〉洋人銀元、〈天船〉的熱氣球、〈察天筒〉的氣壓表、〈量天尺〉象限儀，當然更不乏生活面的〈濃迎〉南島人的番戲和舞蹈、〈丹大〉荷蘭人的晚宴舞蹈，以及〈賭棚〉寫華人聚賭風氣，華人甲必丹管理納稅等。這些羅列的素材和見聞，既是「風俗」、「風尚」的鋪展，也指向一個「風土」的社會性意義。那是王大海走入的馬來世界，先於和並存於外來唐人／華人的行為、制度、習慣、言語等等文化形態。

王大海的南島民族勾勒，除了採風特質，多少有了博物學者在建立客觀性觀察時的細節捕捉，碎片式經驗的填補。然而，就在碎片裏，軌跡性的華夷轉變，出沒在一些語詞的表述。無法用漢語精準描摹的經驗，雜用南島語的音譯詞彙，進而貼近這套經驗的寫作，其實多了一種中介間(liminality)寫作的意義。南島語族作為被認識的客體，而觀察者王大海身為認知主體，一種華夷參照下的主體性，透過這種中介間的範疇，讓「華／華人」作為一個參與風土生態的觀照後，而有了對南島語族的知識把握和認知。

旅居十載以後，當王大海要離去歸國，他對此地的讚美與缺憾，盡在可愛與可惜的兩種情緒之間，看出了華人寄居其中的複雜體驗。

〈噶喇吧〉

余謂西洋之地，有可愛者，亦有可惜者。天氣不寒，頻年如夏，百花暢茂，四季俱開。冬春之際，夜雨朝晴，此時景之艷陽可愛也。俗重斯文，尚風雅，喜逢迎，善褒獎。人或窮困相投，未有拒卻，或通譜，或瓜葛，皆無異視。童子見客，揖讓為禮。婢僕見主，屈膝為敬，此人情之古厚可愛也。地土肥沃，日用平易，斗米二三十文，雞鶩賤於蔬菜，緡錢便可納婢，此風俗之便宜可愛也。然無諸子百家以資博覽，無知己良朋以抒情懷，無幽巖古剎以肆遊玩，是為可惜耳。(王大海 5-6)

王大海著眼此地，觀察時景之艷陽、人情之古厚、風俗之便宜，都是可愛之處。然而，他的失落和遺憾，卻是突顯士大夫群體的文化慣習的某種犧牲。讀書、抒情與遊樂，這恰恰是「華／華人」立場和視角背後，擔負的文化涵養和生活品味。馬來世界裏的洋人與南島語族共存的風土無法滿足王大海的文化、逸樂需求，等於在現實生活脈絡裏，橫亘於華夷之間的文化鴻溝。表面上，這回到了一個華夷之界的觀念，詩學禮樂的華夏嚮往和緬懷，對照「窮奢極慾」的「西洋之樂」(王大海 21)。王大海辭別離去的「冠冕」託詞，刻意在文化層面製造失落感，合理化自己回歸故里的理由。但他走訪大量南島印象完成的寫作，恰恰以馬來世界的風土形成有趣的反證。

從荷蘭人到其他南島語族，馬來世界的風土複雜性，建立了「華／華人」的自我辨識。王大海的敘述，展現華、洋、夷的游牧視點，不能忽視的是人與風土的動態耦合和聯繫。遊記裏的「華／夷之辨」，實際上已是「華／夷之變」的微妙展示，那是文化接觸展露的知識與地方風土，馬來世界裏的殖民城市和移民社會的史／勢觀察。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數個聚焦寫作噶喇吧或巴達維亞視野的文本裏，《海島逸志》的寫作打開了一個馬來世界的華夷風土觀，映照中國旅人對馬來世界的「察勢觀風」。

◎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審查意見和修訂建議使得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本文的前置準備受到國立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漢詩·海洋·華夷風：漢詩的東亞、南海與太平洋視域」(NTU-109L7833)支持，特此致謝。此文亦為科技部一〇九年度研究計畫「海上詩路與馬來世界：十八至廿世紀漢詩文裏的南海行旅和風土寫作」(MOST 109-2423-H-002-003-MY3)之部分執行成果。

註 釋

1. 審查人提醒，十八、十九世紀裏的「華人」和我們今天談的「華人」不是同一回事。那時可還沒有「華人」的民族認同。那時的華人，是政治與文化雙重意義的中國人。筆者基本同意這個觀點。根據史料文獻裏，明清以降出洋的中國人，在海外稱為「華人」、「唐人」並不少見，例如《公案簿》就以「唐人」紀錄。本文關注的巴達維亞，十六世紀初期以降就有華人甲必丹的委任制度，以及公堂議事，處理華人自己的事務。華人聚居的社群由此展開，華人或唐人的認同自然多屬中國人的民族認同。但在唐番通婚、入伊斯蘭教等現象漸趨普遍，華人及其後裔作為一個群體的民族意識，如何觀察、辨別他族，並跟其他民族文化共處和融合，以及在殖民社會裏被管治，都關係到華人在南洋風土裏的自我確認過程。
2. 蘇門答臘跟爪哇之間隔著巽他海峽，爪哇偏東有峇里島、龍目島、東汶(Timor)等眾多島嶼，落在爪哇海(Java Sea)、弗羅勒斯海(Flores Sea)上。再往東北則是稱為香料群島的摩鹿加群島(Moluccas)，連結班達海(Banda Sea)、摩鹿加海(Moluccas Sea)。爪哇以北是婆羅洲，目前為印尼和馬來西亞領土，在其東邊，隔著望加錫(Makassar)海峽，則是蘇拉維西島，北邊連接蘇拉維西海(Celebes Sea)、蘇錄海(Sulu Sea)，那是菲律賓賓南端呂宋島的海域。

3. 但論者指出，在一八六〇年後，頗富貶抑色彩的「夷」逐漸被其他對外稱詞「洋」、「西」、「外」所取代。這個概念的嬗變，離不開西學、西洋船堅砲利，以及夷務轉為外交的背景（方維規 24-23）。但作為思想觀念的夷夏之防、華夷之辨如何隨著世界觀的重建和改變，則有更繁複的面向值得討論。
4. 近年關於晚清遊記和跨國行旅的重要研究，多涉及物質文化、女性主體，以及世界觀的形塑，較無從風土概念討論行旅經驗（陳室如 2014；羅秀美 2021；張治 2014）。
5. 這如同王德威的表述：「勢」總已暗示一種情懷與姿態，或進或退，或張或弛，無不通向實效發生之前或之間的力道，乃至不斷湧現的變化。參見王德威(2018)，頁 19-20。
6. 關於耶婆提的實際地點，古時為蘇門答臘、爪哇之共同名稱。參見法顯，頁 144-145。
7. 除了以上提及的中外交通史文獻，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明代鞏珍《西洋番國志》、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黃衷《海語》、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清代王大海《海島夷志》、謝清高《海錄》等都是述及南海國度及海道針路的重要專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僅有法顯、義淨、汪大淵、馬歡、費信、王大海等人有實地域外經驗，其餘大多屬記載與轉錄海商之言，或憑通事轉譯而得。
8. 從一九二〇年代以降，海上絲路或南海航路的相關研究成果眾多。近年延續此議題的論著，可參見周運中(2015)。
9. 關於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亞洲海上貿易的變化，詳見 Ptak(2018)，頁 183-197。
10. “Nusa”是借自梵文的「島嶼」概念，“antara”則是梵文「外部、跨越」的意思。在印度另有“Dwipantara”的稱謂。“Dwipa”是「島嶼」。滿者伯夷是十三世紀在東爪哇建立的印度化國家，其國力於十四世紀達至巔峰，成為當時東南亞的最強盛的國家，統治範圍擴至馬來半島的新加坡、吉打、彭亨、吉蘭丹等，但後為爪哇地區興起的伊斯蘭國家淡目(Demak)所滅。其在強盛時期屬於東西方宗教、貿易、文化交流的紐帶。然而，此詞彙在西方殖民時代淹沒多年，直到一九二〇年代才重新被提出，以及根據馬來語對“antara”的解釋，賦予新的意義：「在兩個大洲或海洋之間的島嶼」(Soebachman 15)。
11. 在連接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爪哇海、班達海、蘇拉維西海、蘇錄海、呂宋海峽之間，有著占族、爪哇人、馬來人、泰國人、中國人、淡米爾人的貨品交易和族群交流，以及印度、伊斯蘭與中國的宗教和文化交織。尤其在數百年間，周遭貿易帝國的崛起和衰亡，如扶南帝國、吉打王國、室利佛逝，以及在爪哇、峇里島、蘇門答臘輪替的島嶼政權，形構了這片海域文明(Miksic 25-92)。
12. 濱下武志提出中國在亞洲海洋是透過朝貢貿易體系擴大和主導中華秩序。參見濱下武志(1999)。
13. 關於馬來世界，另有現實的民族主義意義。馬來西亞部落客為了論證馬

來人為原生的「土地之子」(Bumiputera asal)，藉人類學和語言學的證明馬來人為南島語族的一員，並以馬來半島和爪哇等地的古代馬來城邦，建構出連接室利佛逝、馬六甲王朝的「馬來世界」。參見 Srikandi, Al-Semantani & Ibnu Rusydi (2018)，頁 3-69。

14. 參見白石隆(2018)，頁 26-31。
15. 維利里奧(Paul Virilio)關於「軌跡性」觀點的啟發：「我們忘記了道路的本質，即旅程。……除了在機械學、彈道學或天文學領域，我們似乎仍然無法認真對待這一路徑問題。客觀性、主觀性，當然，但絕不是軌跡性」。參見 Virilio(1997)，頁 23-24。
16. 中國史地書籍對南海諸國不乏記載，《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的「邊裔典」就總結了清康熙年間以前的重要文獻。但這類記載在譯音、譯名的不一致和混亂，尤其歷代重譯之訛，道聽途說之記載，致使誤解也不少見。馮承鈞先生於一九二〇年代譯註相關文獻就有此感慨。見費琅(2002)，頁 3, 69。
17. 關於《開吧歷代史記》的討論，最早有許雲樵的輯注，後有包樂史、聶德寧的校注、翻譯和討論。參見許雲樵(2017)，頁 114-210；Blussé & Denning (2018)。
18. 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首刊於漳州，道光年間另有靜觀齋刊本（齋本，一八四二年）、《舟車所至》的琴川鄭氏青玉房刊本（舟本，一八四三年）。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四九年有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文譯本(*Chinaman Abroad, or a Desultory Account of Malayan Archipelago, by Ong Tae Hae*)，由上海墨海書館出版。參見南溟子(1992)，頁 197。此書有姚楠、吳琅璇合作的校注本。關於《海島逸志》最初刊印時間的討論，姚楠主張一八〇六年，吳琅璇則因為書內敘及英國人從荷蘭人手中取得爪哇（一八一一年），刊印應在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六年之間（吳琅璇 1996: 67）。
19. 在清代以前中國對外交通史籍，少見長年旅居南洋國度的經驗寫作，而且不少是耳聞筆錄。對於「馬來群島世界」的描寫，記錄較明確詳細的，也是到元史以降，汪大淵《島夷誌略》等書涉及爪哇、室利佛逝、婆利相關國度地域的簡要描述。大部分皆屬海商（如汪大淵）或使節報告。
20. 論者對《海島逸志》的研究，多有指出其反映吧國華人情況、荷蘭殖民統治記載、華僑人物立傳、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等面向。對於書中的馬來世界華夷風土討論則較欠缺。參見吳琅璇(1996)；鄭鏞、連心豪(2009)。
21. 相關序言，及作者自序僅見於漳本。王大海(1992)，頁 ix-xiv。
22. 清初海禁政策不僅官方不出洋，連民間也不得私自出海。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實施南洋禁海令，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同意廢除禁海令，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同時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一七五七年乾隆宣佈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個海關的對外貿易，只留下廣州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
23. 一六六八至一六六九年間甚至與南西里伯斯的波尼蘇丹國(Kesultanan

Bone)、索平王國的武吉士人的武裝力量結盟，發動望加錫戰爭入侵戈瓦(Gowa)，戰敗的武吉士一望加錫軍人逃往爪哇、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等地，成為馬六甲海峽上的商人、海盜與僱用兵。一七二一年廖內王國發生政變，武吉士人趁勢掌控了廖內王國的實權，以此為根據地，進一步掌握了馬六甲海峽至爪哇海域的制海權。

24. 關於武吉士人海上霸權的相關敘述，可參見白石隆(2018)，頁 28-38。
25. 明代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張燮《東西洋考》、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等著述的體例，基本以國別考略南海諸國。這類對外交通筆記涉及描寫的國別，大體是鄭和下西洋以降東西洋航道見聞的地域和島嶼。
26. 有趣的是，此文被收錄在十九世紀末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培訓公務人員，熟悉新馬社會素材的華文讀本《三州府文件修集》(一八九四年)。這又是另一種華夷視點的參照。參見藍鼎元(2020)，頁 86-87。
27. 關於巴達維亞盛衰的種種描述，可參考 Blussé (2010)，頁 36-43。
28.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醫記載：「華人的妻妾多是從巴厘島和望加錫買來的女奴，皮膚不太黑，呈黃褐色，身材短小而勻稱。只要養得起，他們要多少妻妾，就可以有多少。當某個華人死後，他的繼承人便將他所有的妻妾全部出售，只留下死者生前最鍾愛的一個，按照遺囑給予自由，列為正房。其所生的子女也就被承認為是真正的華人。」參考 Fryke (1986)，頁 33。
29. 包樂史指出，到了一七一〇年底，吧城一百三十家制糖者，有七十九家是華人企業(Blussé 1997: 80)。
30. 《海島逸志》的爪亞的條目，就明確記載：「其人粗蠢愚直，不達事理，胸無宿物，怡然聽受。……然後制於和蘭，役使如奴隸，遵循維謹，不敢少懈」(王大海 60)。
31. 可以參見楊儒賓的表述：「從自然義延伸至社會義時，風即從自然的作用力引申到社會的影響力，與「風氣」、「風土」緊緊相扣的社會身體的概念是『風俗』」(126)。
32. 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廣義馬來族的概念，還可分為以下幾種：馬來—南島語族(Melayu-Austronesia)，今分佈於東南亞、大洋洲、臺灣、紐西蘭、夏威夷等；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Melayu-Polinesia)，今分佈於馬達加斯加、馬來羣島、部分東南亞、伊斯特島；以及馬來—美拉尼西亞語族(Melayu-Melanesia)，今分佈於西太平洋，並橫跨澳洲、巴布新畿內亞、印尼、索羅門群島等(Abdul Rahman Hj. Abdullah x)。
33. 根據華萊士《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Malay Archipelago, 1869)的紀錄，他是粗疏將馬來群島與波利尼西亞的所有族群，分成兩類——馬來人與巴布尼亞人。參見華萊士(2003)，頁 23。
34. 一些混入可蘭經教義的神話故事，諸如《蘇丹伊斯坎達的故事》(Carita Sultan Iskandar)，最初的發源版本都是馬來語，進而透過爪哇語的翻譯，走入爪哇地區。這是伊斯蘭傳播的一部份(Ricklefs 43-44)。

徵引文獻

- Abdul Rahman Hj. Abdullah (2019) *Membongkar Sejarah Pemerintahan Islam di Alam Melayu* (Selangor: Hijjaz Records Publishing).
- Andaya, Leonard Y. (2008)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Trade and Ethnici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8-48.
- 安煥然(2019)《小國崛起：滿刺加與明代朝貢體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 白石隆(2018)《海洋帝國：如何思考亞洲》(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 [2000]。齊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 (1997)《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莊國土、吳龍、張曉寧(譯)(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 (2010)《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沉錄》(*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2008]。賴鈺勻、彭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包樂史、聶德寧 [Leonard Blussé & Nie Dening] (2018) *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 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 (1610-1795)*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 包樂史、吳鳳斌(2002)《十八世紀末吧達維亞唐人社會》(廈門：廈門大學)。
- 包樂史、吳鳳斌(校注)(2002a)《公案簿》，第一輯(廈門：廈門大學)。
- Berque, Augustin (2013) “Mesology (風土論) in the light of Yamauchi Tokuryū's *Logos and lemma.*” *Philosophizing in Asia*, APF series 1: 9-25.
- Berque, Augustin (2017) “From ‘Mediance’ to Places: Interview with Augustin Berque.” *STREAM*, no.4: 122-126.
- Berque, Augustin [邊久留] (2017a)《風景文化》(*La Pensée Paysagère*) [2008]。張春彥、胡蓮、鄭君(譯)(南京：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
- Berque, Augustin (2020) “What Do We Have in Common in the Landscape?” *Manzar* 11.49: 50-59.
- 濱下武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1990]。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Bowring, Philip (2019) *Empire of the Wind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 (London: I.B.Tauris).
- Bowring, Philip [菲利浦·鮑靈] (2020)《風之帝國》(*Empire of the Wind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2018]。馮奕達(譯)(臺北：聯經出

- 版公司)。
- 陳室如(2014)《晚清海外遊記的物質文化》(臺北:里仁書局)。
- Dirlik, Arif (1999)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 22.2: 151-187.
- 法顯(2008)《法顯傳校注》。章巽(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 方維規(2018)〈「夷」、「洋」、「西」、「外」及其相關概念:論十九世紀漢語涉外詞彙和概念的演變〉。《概念的歷史分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52。
- 費信(2019)《星槎勝覽校注》。馮承鈞(校注)(北京:華文出版社)。
- Ferrand, Gabriel [費琅] (2002)《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蘇門答刺古國考》(*Le K'ouen-louen et les anciennes navigations interocéaniques dans les Mers du Sud; L'Empire Sumatranais de Çrivijaya*)。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
- Fryke,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費爾·弗里克] (1986)〈東印度航海記一六八〇~一六八六年〉("East India Voyages 1680~1686")。《熱帶獵奇:十七世紀東印度航海記》(*Voyages to the East Indies*)。姚楠、錢江(譯)(北京:海洋出版社), 1-176。
- Heng, Derek Thiam Soon (2012) *Sino-Malay Trade and Diplomac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18.
- 和辻哲郎(2006)《風土》[1935](北京:商務印書館)。
- 黃遵憲(2005)〈番客篇〉。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33-135。
- 藍鼎元(1995)〈論南洋事宜書〉。《鹿洲全集》,上冊。蔣炳釗、王鈿(點校)(廈門:廈門大學), 54-56。
- 藍鼎元(2020)〈論南洋事宜書〉。柯木林、廖文輝(編注)《三州府文件修集選編》(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 86-87。
- 李伯重(2019)《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李恭忠(2012)〈「倭寇」記憶與中國海權觀念的演進:明中期至清中期海防論著的初步考察利用統〉。鈴木貞美、劉建輝(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諸概念の成立:近代東亞諸概念的成立》,第26卷(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159-172。
- 李慶新(2017)《海上絲綢之路》(香港:香港三聯書店)。
- 梁二平(2018)《海圖上的中國:中國古代海洋地圖學要》(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113-135。
- 劉永連(2012)〈從吧城唐番通婚看中外文化沖突與融合:以吧城華人公館檔案

- 資料為基礎)。馬明達(編):《暨南史學》,第七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20-244。
- 羅秀美(2021)《彤管文心:近代女性文學的賡續與新變》(臺北:學生書局)。
- Medhurst, W.H. (1849) *The Chinaman Abroad, or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ago, Particularly of Java by Ong Tae Ha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 Miksic, John N. (2012) *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Nus Press), 25-92.
- 南溟子(陳佳榮)(1992)〈王大海《海島逸志》諸家版本一覽表〉。王大海:197。
- 聶德寧、侯真平、包樂史、吳鳳斌(校注)(2004)《公案簿》,第三輯(廈門:廈門大學)。
- Pelras, Christian (1996) *The Bugi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Pratt, Mary Louise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2017)《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2008]。方傑、方宸(譯)(上海:譯林出版社)。
- Ptak, Roderich [普塔克](2018)〈一六〇〇~一七五〇年前後的華南港口和亞洲海上貿易〉。《普塔克澳門史與海洋史論集》(*Selected Essays on Macau History and Maritime History by Roderich Ptak*)。趙殿紅、蔡潔華(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83-197。
- Ricklefs, M.C. (2016) *Mystic Synthesis in Java: A History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Norwalk: EastBridge).
- Soebachman, Agustina (2012) *Sejarah Nusantara: Berdasarkan Urutan Tahun*. (Yogyakarta: Syura Media Utama).
- Srikandi, Al-Semantani & Ibnu Rusydi (2018) *Membongkar Rahsia Dunia Melayu: Pribumi Asia Tenggara Menjawab Kekeliruan Sejarah* (Selangor: Hijaz Records Publishing).
- Virilio, Paul (1997) *Open Sky*. Trans. Julie Rose (London: Verso).
- Wallace, Alfred R. [阿爾弗雷德·華萊士](2003)《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1869]。金恆鏞、王益真(譯)(臺北:馬可孛羅)。
- 王大海(1992)《海島逸志》[1791]。姚楠、吳琅璇(校注)(香港:香港學津書店)。
- 王德威(2015)〈華夷風起〉。《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36-50。
- 王德威(2018)〈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野〉。《中國現代文學》no.34: 1-28。

- 王賡武(1986)〈《海國聞見錄》中的「無來由」〉。姚楠(編譯):《東南亞與華人: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06-119。
- 王賡武(1988)《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姚楠(編譯)(香港:中華書局)。
- Warren, James Francis (2014) *The Sulu Zone 1768-1898: The Dynamics of External Trade, Slavery, and Ethnic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Stat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 吳琅璇(1996)〈王大海與《海島逸志》〉。《社會科學》(上海電視大學寶山分校) no.4: 64-67。
- 許雲樵(2017)〈《開吧歷代史記》校注〉。鄭良樹(編):《許雲樵全集》, 第十卷(吉隆坡:馬來西亞創價學會), 114-210。
- 楊儒賓(2018)《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燮(2000)《東西洋考》[1617]。謝方(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 張治(2014)《異域與新學:晚清海外旅行寫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鄭鏞、連心豪(2009)〈論《海島逸志》的史學價值〉。《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no.1[191]: 75-81。
- 鍾錫金(1993)〈吉打兩千年〉。《吉隆坡:赤土文叢》(mag.sinchew-i.com/kedah2000/index.phtml?sec=596&sdate=&artid=200110150425)。
- 周運中(2015)《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WORKS CITED

- Abdul Rahman Hj. Abdullah (2019) *Membongkar Sejarah Pemerintahan Islam di Alam Melayu* (Selangor: Hijjaz Records Publishing).
- Andaya, Leonard Y. (2008)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Trade and Ethnici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8-48.
- Berque, Augustin (2013) "Mesology (風土論) in the light of Yamauchi Tokuryū's *Logos and lemma*." *Philosophizing in Asia* APF series 1: 9-25.
- Berque, Augustin (2017) "From 'Mediance' to Places: Interview with Augustin Berque." *STREAM*, no.4: 122-126.
- Berque, Augustin (2017a) *Fengjing wenhua (La Pensée Paysagère)* [2008]. Trans. Zhang Chunyan, Hu Lian & Zheng Jun (Nanjing: Phoenix Science Press).
- Berque, Augustin (2020) "What Do We Have in Common in the Landscape?" *Manzar* 11.49: 50-59.
- Blussé, Leonard (1997) *Badaweiya huaren yu Zhong-He maoyi (The Chinese of Batavia and Sino-Dutch trade)*. Trans. Wu Long, Zhang Xiaoning & Zhuang

- Guotu (Nanning: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Blussé, Leonard (2010) *Kandajian de chengshi: Dongya san shanggang de shengshuai fuchen lu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2008]. Trans. Lai Yuyun & Peng Fa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Blussé, Leonard & Nie Dening (2018) *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 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 (1610-1795)*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 Blussé, Leonard & Wu Fengbin (2002) *Shiba shijimo Badaweiyi tangren shehui [Chinese Society in Late-18th Century Batavia]*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Blussé, Leonard & Wu Fengbin (annot.) (2002a) *Gong An Bu (diyiji) [The Records of Civil Disputes in Batavia (Volume 1)]*.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Bowring, Philip (2019) *Empire of the Wind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 (London: I.B. Tauris).
- Bowring, Philip (2020) *Feng zhi diguo (Empire of the Wind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 Trans. Feng Yid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 Chen Shiru (2014) *Wanqing haiwai youji de wuzhi wenhua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Overseas Travel Wri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ipei: Li Ren Publishing Co.).
- Dirlik, Arif (1999)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Review(Fernand Braudel Center)*, 22.2: 151-187.
- Fa Xian (2008) *Fa Xian zhuan jiaozhu [A Commentary on the Biography of Fa Xian]*. Ed. Zhang X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 Fang Weigui (2018) "'Yi,' 'yang,' 'xi,' 'wai' ji qixiangguan gainian: Lun shijiu shiji hanyu shewai cihui he gainian de yanbian"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Western" in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oreign-related Terms and Concep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ainian de lishi fenliang [Historical Weight of Concept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52.
- Fei Xin (2019) *Xingcha shenglan jiaozhu [A Descriptive Survey of the Starry Raft]*. Ed. Feng Chengjun (Beijing: Sino-Culture Press).
- Ferrand, Gabriel (2002) *Kunlun ji nanhai gudai hangxing kao: Sumendala guguo kao (Le Kouen-louen et les Anciennes Navigations Interoceaniques dans les mers du sud; L'Empire Sumatranais de Çrivijaya)*. Trans. Feng Cheng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 Fryke, Christopher (1986) "Dong yindu hanghai ji yiliubaling-yiliubaliu nian" [A Voyage to East India 1680-1686]. *Redai lieqi: Shiqi shiji dong yindu hanghai ji [Tropical Hunting: A 17th Century East Indian Voyage]*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1-176.
- Hamashita Takeshi (1999) *Jindai Zhongguo de guoji qiji: Chaogong maoyi tixi yu jindai Yazhou jingji quan (External Forc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1990]. Trans. Zhu Yingui & Ouyang Fe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 Heng, Derek Thiam Soon (2012) *Sino-Malay Trade and Diplomac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18.
- Hsu Yun Tsiao (2017) “Kaiba lidai shiji jiaozhu” [Notes on *History of the Reclamation of Batavia*]. Tay Lian Soo (ed.): *Xu Yunqiao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Hsu Yun Tsiao]*, vol.10 (Kuala Lumpur: Soka Gakkai Malaysia), 114-210.
- Huang Zunxian (2005) “Fanke Pian” [The Foreigners]. Chen Zheng (ed.): *Huang Zunxian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ang Zunxian]*, vol.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33-135.
- Lan Dingyuan (1995) “Lun Nanyang shiyi shu” [Book on Southern Ocean Matters]. *Luzhou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Lan Ding-yuan]*, vol.1. Eds. Jiang Bingzhao & Wang Dian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54-56.
- Lan Dingyuan (2020) “Lun Nanyang shiyi shu” [Book on Southern Ocean Matters]. Ke Mulin & Liao Wenhui (eds.): *Sanzhoufu wenjian xiuji xuanbian [Selected Documents of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86-87.
- Li Bozhong (2019) *Huoqiang yu zhangbu: Zaoqi jingji quanqiuhua shidai de Zhongguo yu dongya shijie [Muskets and Ledgers: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 Li Gongzhong (2012) “‘Wokou’ jiyi yu Zhongguo haiquan guannian de yanjin: Mingzhongqi zhi qingzhongqi haifang lunzhu de chubu kaocha liyongtong” [Memory of “Japanese Pirat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oncept of Maritime Power: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Unification in Maritime Defense Writings from the Mid-Ming to Mid-Qing Periods]. Suzuki Sadami & Liu Jianhui (eds.):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oncepts in East Asia: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ast Asian Concepts*, vol.26 (Kyo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159-172.
- Li Qingxin (2017) *Haishang sichou zhi lu [Maritime Silk Road]*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 Liang Erping (2018) *Haitu shang de Zongguo: Zongguo Gudai Haiyang ditu juyao [China on the Map: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Maps]*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113-135.
- Liu Yonglian (2012) “Cong Bacheng tangfan tonghun kan Zhongwai wenhua chongtu yu ronghe: Yi Bacheng huaren gongguan dangan ziliao wei jichu” [Sino-Foreign Cultural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Chinese-foreign Intermarriage in Batavia: Based on Archival Data from the Batavia Chinese Public House]. Ma Mingda (ed.): *Jinan History Studies*, vol. 7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20-244.
- Luo Xiumei (2021) *Tongguan wenxin: Jindai nuxing wenxue de gengxu yu xinbian [The Continuation and New Changes of Modern Women’s Literature]* (Taipei:

- Student Books Co.).
- Medhurst, W.H. (1849) *The Chinaman Abroad, or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ago, Particularly of Java by Ong Tae Ha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 Miksic, John N. (2012) *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Nus Press), 25-92.
- Nan Mingzi (Chen Jia-rong) (1992) “Wang Dahai *Haidao yizhi* zhujia banben yilanbiao” [List of Various Editions of Wang Dahai’s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Wang Dahai: 197.
- Nie Dening, Hou Zhenping, Leonard Blussé & Wu Fengbin (annot.) (2004) *Gong An Bu [The Records of Civil Disputes in Batavia]*, vol.3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Onn Huann Jan (2019) *Xiaoguo jueqi: Manlajia yu Mingdai chaogong tizhi [The Rise of a Small Nation: Malacca and the Ming Dynasty Tribute System]* (Nan Chang: Jiangx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shing House)
- Pelras, Christian (1996) *The Bugi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Pratt, Mary Louise (2017) *Diguo zhiyan: Luxing shuxie yu wenhua huhua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2008] Trans. Fang Jie & Fang Chen (Shanghai: The Yilin Press).
- Ptak, Roderich (2018) “Yiliulingling-yiqiwuling nian qianhou de Huanan gangkou he Yazhou haishang maoyi.” *Putake Aomen shi yu Haiyang shi lunji [Ptak’s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cao and Maritime History]*. Trans. Zhao Dianhong & Cai Jiehua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83-197.
- Ricklefs, M.C. (2016) *Mystic Synthesis in Java: A History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Norwalk: EastBridge).
- Shiraishi Takashi (2018) *Haiyang diguo: Ruhe sikao Yazhou [Ocean Empire: How to Think about Asia]*. Trans. Qi P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Soebachman, Agustina (2012) *Sejarah Nusantara: Berdasarkan Urutan Tahun.* (Yogyakarta: Syura Media Utama).
- Srikandi, Al-Semantani & Ibnu Rusydi (2018) *Membongkar Rahsia Dunia Melayu: Pribumi Asia Tenggara Menjawab Kekeliruan Sejarah* (Selangor: Hijjaz Records Publishing).
- Virilio, Paul (1997) *Open Sky*. Trans. Julie Rose (London: Verso).
- Wallace, Alfred R. (2003) *Malai qundao ziran kaocha ji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 [1869]. Trans. Jin Hengbiao, Wang Yizhen (Taipei: Marco Polo Press, Inc.).
- Wang Dahai (1992) *Haidao yizhi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Ed. Yao Nan & Wu Langxuan (Hong Kong: Xuejin Books).
- Wang Gungwu (1986) “*Haiguo wenjian lu zhong de wulaiyou*” [The ‘No Reason’ in the *Anecdotes of the Sea*]. Yao Nan (trans. & ed.): *Dongnanya yu huaren: Wang*

- Geng-wu jiaoshou lunwen xuanji*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elected Essays by Professor Wang Gungwu*]. Ed. & trans. Yao Nan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 106-119.
- Wang Gungwu (1988) *Nanhai maoyi yu Nanyang huaren* [*Trade of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Chinese in Nanyang*]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
- Wang, David Der-wei (2015) “Huayifeng qi” [When the Wind of the Xenophone Blows]. *Huayifeng qi: Huayu yuxi wenxue sanlun* (*When the Wind of the Xenophone Blows: Malaysia and Sinophone Literature*) (Kaohsiu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SYSU), 36-50.
- Wang, David Der-wei (2018) “Huayi zhi bian: Huayu yuxi yanjiu de xin shiye” [Sinophone/Xenophone Studies: Toward a Poetics of Wind, Sound, and Changeability].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no.34: 1-28.
- Warren, James Francis (2014) *The Sulu Zone 1768-1898: The Dynamics of External Trade, Slavery, and Ethnic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outheast Asian Maritime Stat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 Watsuji Tetsuro (2006) *Feng Tu* [*Climate and Culture*] [193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u Langxuan (1996) “Wang Dahai yu Haidao yizhi” [Wang Dahai and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Social Sciences*, no.4: 64-67.
- Yang Rurbin (2018) *Wuxing yuanlun: Xianqin sixiang de taichu cunyou lun*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The Primordial Theory of Existence in Pre-Qin Thought*]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 Zhang Xie (2000) *Dongxiyang kao* [*A Historical Study of Southeast Asia*]. Annot. Xie F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 Zhang Zhi (2014) *Yiyu yu xinxue: Wanqing haiwai luxing xiezuo yanjiu* [*Foreign Lands and New Learning: A Study of Overseas Travel Wri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ong & Lian Xinhao (2009) “Lun Haidao yizhi de shixue jiazhi”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Significance of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no.1[191]: 75-81.
- Zhong Xijin (1993) “Jida liangqian nian” [Two Thousand Years’ History of Kedah]. *Pustaka Tanah Merah* (mag.sinchew-i.com/kedah2000/index.phtml?sec=596&sdate=&artid=200110150425).
- Zhou Yunzhong (2015) *Zhongguo nanhai gudai jiaotong shi* [*Ancient History of Sino-South Seas Relation*]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摘 要

本文聚焦南海和馬來群島海域，透過航路與異地生活為基點的觀察視域，檢視漢語文獻裏華人進入海域間的馬來世界，重探與構建華人與馬來世界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透過遊記自身的視域，從文學、文化、歷史等不同體驗和想像層面，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遊記在表徵新世界的可能和侷限。我們觀察這些文獻如何「看見華人」，以及華人如何「看見馬來世界」。本文以乾隆年間旅居爪哇，入贅當地甲必丹家族的王大海《海島逸誌》（一七九一）為例，檢視其涉及爪哇島及其周邊群島的風物與地理描述，透過遊記的跨文化接觸，揭示自我與他者識別的軌跡(trajectivity)變化和華夷風土視野。經由文本及其周邊知識的鋪陳和解讀，討論華人面對洋人和南島語族的交織視域，以及對殖民地和南島歷史、習俗的探究，進而揭示王大海的島嶼視野與「風」的多元觀照。本文主張《海島逸志》的「華／夷之辨」，實際上已是「華／夷之變」的微妙展示，作為華人南島意識的馬來風景，在華夷的二元框架裏窺見「變」的裂隙和可能。

關鍵詞：南海、風土、海島逸志、南島、華夷風

Wind and the Malay World Sinophone/Xenophone Terroir in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KO Chia Cia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hinese encountered with the Malay world, particularly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rough the cross-reference of travelogue and Chinese poet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contact zone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Malay world through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voyage to and life experience in a foreign land. Through the visions of the travelogue,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iterary,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ravelogue in representing the new world. We observe how writers of these documents see Chinese and how Chinese sees the Malay world. This article analyses

of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landscape and geography of Java and its surrounding islands in *Haidao Yizhi*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1791), by Wang Dahai, who lived in Java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later became a member of the local Kapitan family. Wang Dahai's vision of the island and the multifaceted view of "wind" is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on the Dutch, the English and the Austronesian, as well as the exploration of colonial and Nusantara history and custom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Malay landscape in a Chinese Nusantara framework, in effect, reveal the subtle changes in the trajectory of self- and other-identification and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landscapes, providing a glimpse into the cracks and possibilities of "changes" within the dualistic framework of Sinophone/Xenophone.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s, Mesology,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Nusantara, Sinophone/Xenophone